

OLD PHOTOS

# 老照片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我的岳父孙定国 沈宁  
爱北京的洋人们 张鸣  
1973年：野营白龙潭写真 王秋杭  
赛珍珠在南京金陵大学的寓所 鲜继根  
读图与读史 杨潜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照片.第97辑/冯克力主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474-1380-7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 - 史料②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25691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40毫米×203毫米  
6印张 129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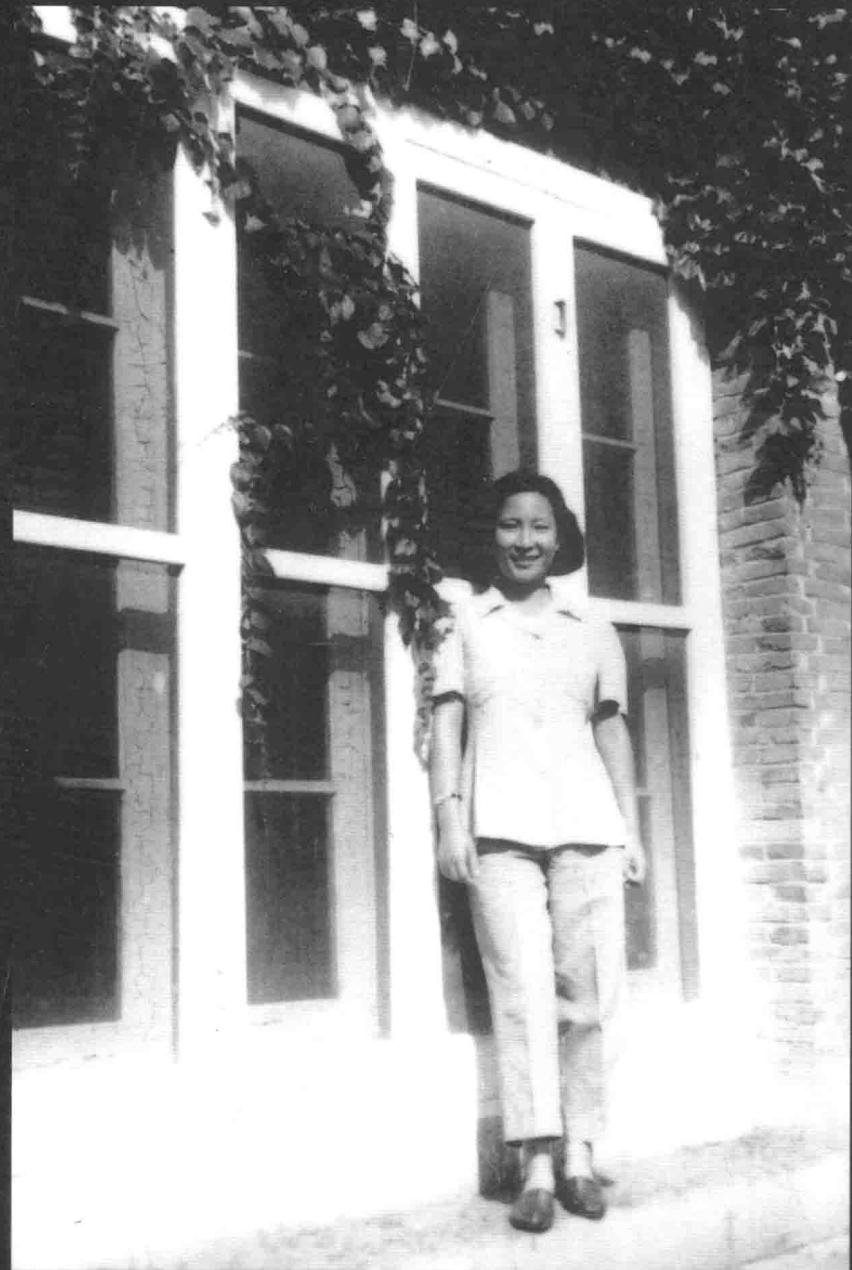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 迎 亲

1950 年代初，山东农村某地的迎亲队伍行进在乡间小路上。

1950 年新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照片里的迎亲队伍，没有花轿，没有大箱小笼的嫁妆，也没有吹吹打打的乐手。新郎、新娘各骑了一匹马，或许是面对镜头的缘故吧，看上去还有些拘谨，多亏了几位扭着秧歌走在前面的农村妇女，她们舞动的身影，为这移风易俗的迎亲增添了几分喜庆。（锐明）



1950年代初，鲜继根在赛珍珠南京故居前留影。

（参见本辑《赛珍珠在南京金陵大学的寓所》）

出版人 尹奎友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第九十七辑

**目 录**

沈 宁 我的岳父孙定国 .....	1
张 鸣 爱北京的洋人们 .....	12
仲 炜 表舅蒋恩铠一家 .....	24
阎 明 傅英豪和唐旦 .....	37
杨大容 我参加了两次国庆阅兵 .....	51
王秋杭 1973年：野营白龙潭写真 .....	57
周孜仁 1980年代的笔会热 .....	67
邹士方 三十年前拍《火龙》 .....	76
谢守一 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	89

贺 阳	父母新疆来去	103
震 斋	曾是体育明星的母亲	115
方小龙	我的父辈	118
马西良	故乡的记忆	129
李百军 80年代临沂城——沂州路		133
胡 剑	萧毅肃与芷江受降	142
张 俊	徐源泉与沙市市政建设	152
鲜继根	赛珍珠在南京金陵大学的寓所	163
黄建栋	一张淞沪抗战烈士的全家合影	170
谭金土	桃坞中学片断	173
邢红英	长沙一中的合影	179
杨 潜	读图与读史	182
阿 果	放不下的《老照片》	185
冯克力	那顶曾经的“紧箍咒”	188
封 面	蒋恩铠和妻子李芬的合影（仲炜）	
封 二	迎亲（锐明）	
封 三	1950年代初，鲜继根在赛珍珠南京故居前留影（鲜继根）	

# 我的岳父孙定国

沈 宁

他是我的父辈，但不是我父亲母亲的师长或朋友，也不是我们家族的世交叔伯。他是我的岳父，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的妻子六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但是因为仰慕他的大名，所以我才想到要结识他的女儿。上世纪70年代，中国还处在阶级斗争的红色恐怖之中。如同我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出身的青年，毫无前途，也毫无友情，没有人会愿意受到我们家庭的牵连，所以更谈不上恋爱。我能够体会到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所以很早就决定，放弃恋爱和结婚的权利，我自己已经够不幸了，不能再拖累一个女孩子，更何况如果是我爱和爱我的女孩子。再说那个时代，我的身边也太少有文化的女孩子，不交女友对我而言，并无太多遗憾。

那些年中，我一直孤独，尽量躲避一切红色或粉红色家庭出身的青年，包括男青年和女青年，甚至躲避一切非黑色和白色家庭出身的青年，顶多只敢去跟一些同样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接触，知道这些人至少没有理由五十步笑百步，过分嫌弃我的家庭出身。因此当我偶然听见一些同事出言不逊，攻击



1950年，孙定国夫妇在北京。

孙定国先生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哲学家的女儿，当时居然是我们剧团里的一个学员，不过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

哪一年听说过孙定国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上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城里走红，做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兼哲学教研

室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时候，我还年幼，且对哲学毫无兴趣，更对共产主义理论很不以为然。所以想必是后来，因为毛泽东发动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反革命理论的政治运动声势浩大，而孙定国是杨献珍反党集团的重要干将，竟敢跟毛泽东唱反调，倒让他名气冲天，连我那么个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了。那些年间，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总结出凡是官方赞扬的，并非个个都是好人，而凡官方刻意要打倒的，我相信大半都不是坏人。

孙定国先生，1910年在山东牟平出生，其父母家境都非常贫寒，母亲十三岁到孙家做童养媳。孙定国上面有三个姐姐，他是家中头一个男孩，所以肩负孙家厚望，起名儒熙。小儒熙出生的七天头上，姐姐们在炕上玩耍，砸到他身上，他当时就窒息而死。家人掘墓，准备埋葬。只有他的祖母不答应，仍将孙儿留在家里，嚎哭呼唤，不料那小婴儿夜半忽然苏醒过来。死而复生，命不该绝，大难不亡，必有后福。他更成了家里的宝贝，全家人省吃俭用，把八岁的小儒熙送入本村小学读书。

学校校长是个前清贡生，学问渊博，见小儒熙聪慧异常，便以“小圣人”来称呼他，他立刻名扬乡里。小儒熙十二岁跟同学打架，被老师罚写“九九表”。他写完之后，又在黑板上书写：现乃共和国家，主张自由平等，如此处罚，我不服。校长得知，为彰校规，三次用戒尺惩戒，直打得小儒熙皮开肉绽，夜不能眠，但他仍然不肯屈服，后来又被罚站七日，他仍说：不服。

之后因为家里实在付不出学费，小儒熙只好辍学。十三岁进入一家私塾，边教书，边读书。三年之后，孙儒熙十六岁，自办私塾，收学生十几人，自此开始教书谋生。他教学得法，

用心努力，成绩卓著，远近闻名。十七岁时，孙儒熙应聘到外村任教，连年长薪水。十九岁他再次自办学校，专门教授穷人子弟，学生曾经多达百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孙儒熙怒而出走，决定投笔从戎，挺身救国。他打听到孙殿英率部挺进热河，两度击败日军，发布告征募青年从军。孙儒熙立刻出发，长途跋涉，从山东赶到北京，又续往绥远，终于找到孙殿英部，登记入伍，那年他二十三岁。不料孙殿英招到兵马之后，不再东进抗日，反而率部西转内地。孙儒熙眼见跟随孙殿英部抗日无望，乃冒死逃离，落魄河北、山西各地，风餐露宿，四处流浪。就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孙定国，表达立志报国之意。

1934年，孙定国在山西加入晋绥军。当时中国的军队，多武夫而少文人，孙定国知书识字，很快就升做军中的帮写副官。不久晋绥军军官教导团招收学员，他随即报名，而且顺利考入。在接受军官培训的两年里，孙定国节衣缩食，刻苦攻读，博览兵书，特别研习步兵组建和训练，以及作战方略指挥等课程。也是在那个学员队里，孙定国开始与一些共产党学员交上了朋友，不过当时共产党员身份不公开，他并不知道那些人是共产党。1936年从教导团毕业，孙定国受任太原中学军事教官，后又任山西学生军训练总队教官，授衔上尉。

1936年10月，日寇向华北节节进逼，延安共产党中央派薄一波赴山西，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分化阎锡山的部队。那时孙定国担任山西国民军团教导团副官，被薄一波发展为牺盟会第一批会员，但他只知该组织是抗日群众组织，并不了解其共产党领导的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华北危机。孙定国被调到山西军政委员会，在阎锡山为校长的第二战区随营学校做军事教官，负责全校军事课程和训练。稍后山西建立新军民族革命政治保卫队，孙定国任参谋主任，负责军事指挥。同年五月，调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任营长，后任汾南地区教导第三总队总队长兼十三县自卫队总教练，开始直接对日作战。

这年秋天，孙定国率领教导第三总队，多次出击或伏击日寇军队和伪军，屡战屡胜，名扬山西。同年12月，阎锡山任命孙定国兼任第二战区第七区保安司令。同月，牺盟会组建政卫一支队，又任命孙定国为支队长，率领部队反击日寇围剿，消灭投敌汉奸，争取伪军反正，英勇作战，广受人民拥戴，当时孙定国并没有参加共产党。1939年阎锡山按国民军建制，整编新军独立二一二旅，任命孙定国为旅长，下设三个团，近五千官兵，因英勇抗日，战绩辉煌，被汾南人民称为子弟兵。二一二旅和其他整编新军各友军一起，有效地牵制住日军西渡黄河的计划，保卫了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安全。

抗战期间，山西情况特别复杂，很多共产党员在阎锡山政府里任职，所以孙定国跟共产党员来往很多。他率领的部队，同林彪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都曾协同作战过。后来阎锡山不再容忍中共在其军政内部的分化活动，决定进行清洗。12月间，阎锡山秘密派出部队，准备

“围剿”由共产党人直接指挥的新军二一三旅。孙定国获悉内部军情，立刻率领二一二旅部分官兵，星夜奔袭，将阎军中途截回，保护了二一三旅的安全。但万没料到，在孙定国领军阻截阎军、保卫二一三旅安全的同时，二一三旅接到延安密令，认为孙定国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阎锡山，决定把他列为国民党

顽固派，予以逮捕，当即处决。于是二一三旅派出重兵，包围了二一二旅驻地，下了孙定国警卫班的枪，眼看就要冲进他的营房下手杀人，千钧一发之际，二一三旅突然接到新命令：立刻停止。这四个字救了孙定国的性命，也救了许多二一二旅和二一三旅官兵的性命。

1940年2月，柴泽民送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给孙定国的电报，任命孙定国为总指挥，率二一二和二一三两个旅，以及一些地方抗日游击队，近万官兵，组成南路军，转移到八路军太岳军区。孙定国服从了这个命令，指挥这支部队行军九昼夜，征程七百里，打退日伪蒋阎大小十二次进攻，粉碎敌军围追堵截，终于到达太岳军区。战斗中最惊险的一次，孙定国在前线伏案签署命令，敌军子弹四面飞来，甚至打到他签字的桌子上，身边警卫战士甚至有中弹者，但他依旧从容镇定，继续发布各种命令。战士们说：敌人子弹认识孙总指挥，不敢碰他。

当时情况下，孙定国带领近万名英勇善战的官兵加入八路军，对中共军事力量来说，是很大的支持。八路军总部专门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宣布二一二旅保持建制，孙定国继续任旅长。朱德、彭德怀、薄一波、杨尚昆、傅钟等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都会见了孙定国，表示对他的尊重。

1941年1月，孙定国加入共产党。同年5月，八路军太岳军区命孙定国率军南下开辟抗日根据地，粉碎日伪多次围剿，俘虏数百，重创敌军。太岳纵队通令嘉奖二一二旅创造歼敌新记录，誉之为能战斗的部队。可是一年以后，二一二旅被解散了，孙定国被调到一个新部队任副旅长，降了级。1943年，孙定国又被调任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任务是保卫根据地，

进行大生产，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1944年，孙定国调任第五军分区司令。

1945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中国没有赢得和平，更加惨烈的国共内战迫在眉睫。中共晋冀鲁豫军区发出命令，太岳军区改编为野战四纵队，由王新亭任司令，聂真任政委，孙定国任野战四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孙定国奉命兼任中共太岳军区军政学院院长。之后，内战全面展开，中共同国民党正式决裂，八路军改称人民解放军。1947年太岳军区、太行军区和三十八军合编为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大别山，转战中原。孙定国受任兵团后勤司令。

1948年，陈谢兵团并入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淮海大战。激战前夜，孙定国奉命调离部队，回到河北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学习，从此结束戎马生涯。

1949年，孙定国随马列研究院进入北京。该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孙定国担任研究员，后任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党委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成立，叶剑英元帅出任院长，曾专门到中央党校，请孙定国到高等军事学院任教。孙定国在当时中共党内，特别是军内算是个了不起的秀才，毛泽东曾亲自接见过他，对他作出相当的评价。孙定国本是军官教导队教官出身，又曾历经百战，文武双全，正是军事学院需要的教官人选，可是他拒绝了，没有重新返回军队。我曾暗想，如果当年岳父听从叶帅的要求，调军事学院任教就好了，至少他不会五十四岁被害死。但历史没有如果，岳父太爱哲学了，所以只能为哲学献身。

在当时中央党校的行政领导中，杨献珍、侯维煜、孙定国一直被视为三驾马车。照杨献珍的话说，那时杨、侯、孙三人

密切配合，相互体谅，一起聆听少奇同志的教诲，一起贯彻中央的指示，一起抵制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破坏，最后也一起遭受那个理论权威的残酷迫害。至于那个所谓理论权威是谁，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著名的哲学专家，孙定国在中国学术界地位很高，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受命编写第一套中国哲学史教材，参加编写的著名学者包括冯友兰、周辅成、杨宪邦、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而教材审查委员则是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守素、赵纪彬、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胡绳等，还有孙定国。

孙定国在中央党校期间，写一手好文章，又特别会演讲。他能够把深奥的哲学讲得出神入化，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让人听而难忘。多年以后，我遇到过很多中老年人，比如北京四中的一位老校长，谈及岳父他们都清楚地记得。

作为中共党内的哲学家，孙定国忠实地执行和履行自己的使命，1949年到1959年的十年间，在历次理论运动中披挂上阵，不遗余力。比如1953年党中央发动批判梁漱溟，孙定国发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世界观》和《驳斥梁漱溟的职业分途的反动理论》，1954年党中央发动批判胡适，孙定国发表《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实质》等，在当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些行为，现在看来都属错误，但在当时却是忠于党的表现。

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从学术出发，提出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均为哲学要义，竟触怒龙颜，掀起一场由哲学而政治的大迫害。这一次，孙定国没有向政治低头，而是坚持站在杨献珍和哲学真理一边，于是被打成反党集



孙定国全家在中央党校内。

团，置于死地。过去的学界友人，如陈伯达、康生等，非但不出来保护他，反而纷纷反目，落井下石。

1963年，孙定国被调离中央党校。背着一个反党分子的罪名，偌大中国，无人收留，无处可去。孙定国当时作何感想，无从得知。



孙定国追悼会

听岳母说，他们到北京后，一直住在党校的小楼里，算是高干，享有一些特权。但是他们的五个孩子，都从小学开始就住校。我的妻子出生刚满月，便送托儿所全托，每周只回家一天。每人的被褥，分别在托儿所、学校和机关，周末团聚时，家里被褥短缺，只能到党校总务处去租用公家棉被。孙定国一家在北京住了十五年，拢共去饭馆吃过两次饭。他家也从不在家里做饭，一日三餐都去党校食堂，包括十五顿年夜饭。

最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开口，接受孙定国到西北局党校做教员，降了不知多少级，但一家人总算有个落脚之地。1964年举家搬往西安时，康生专门给西北局下达指令：对孙定国内部控制使用。孙定国的家刚在西安安顿好，一道“圣

旨”又将他宣回北京。当时我的妻子只有六岁。她还记得，父亲最后离开家的那天，她正在家门口跳橡皮筋。父亲出门时，把她抱了又抱，亲了又亲，连声说：再见。年幼的小女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以为父亲如常出差。

半年以后，春节的前一天，西北局派员通知家属：孙定国1964年12月18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的湖中淹死，属于叛党自杀。至于他究竟怎么死的？没人知道。尸体何在？早已经火化了。骨灰呢？没有保留。

后来听说，孙定国回北京后，一直不停地接受批判和批斗，乃至受到各种训斥和辱骂。1964年12月19日，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陈伯达称孙定国是冒牌的哲学家，用尽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等种种污辱性词语。孙定国办公桌玻璃板下，原来压着一张陈伯达署名的赠联，抬头有“定国同志”的字样，可在批斗会上，陈伯达声称：“你把我扔到纸篓里练毛笔字的废纸偷出来，裱糊上，到处招摇撞骗，说是我给你写的字，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你是死不要脸！”骂得气极，他竟当众向孙定国的脸上吐唾沫。

就在这天夜里，孙定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陈伯达凭借权势，将孙定国生前用积蓄甚至举债购买的藏书，仅付原价的三分之一，全部席卷而去。

“文革”中，因“合二为一论”影响的“反党分子”，再次遭受冲击凌辱，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冤案才获得平反。